

- 两次东渡求学日本
- 棉湖苦战与惠州攻坚
- 血战龙潭享誉军中
- 坐镇南昌，三次“剿共”
- 《何梅协定》出笼前后
- “西安事变”一场双簧
- 抗日声中后院操刀
- 蒋家王朝的殉葬人

何应钦

何应钦，字敬之，1898年生于贵州兴义县。日本士官学校毕业。黄埔军校总教官，陆军一级上将。历任国民党第一军军长，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军政部长，参谋总长，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国防部长，行政院院长等要职。

在黄埔系中，有蒋、何并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1987年病逝于台湾。

两次东渡求学日本

在日本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以与日本女孩谈恋爱为时髦，何应钦算是其中最“本份”的。

1909年秋，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就读刚进入第二学期的何应钦，得知陆军部要在清河一中、南京四中和武昌三中的该期学生中考选留日学生的消息后，一连几天睡不安稳。这样好的机会，是当时进了军事学校的学生梦寐以求的。

还在贵州陆军小学时，何应钦受教官们影响，对日本军事力量和武士道精神产生崇拜，加上他从历史课本中了解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过“天朝”，在日俄战争中又打败过俄国，于是就萌生了要学军事，就得到日本的想法。现在机会来了，岂能错过？但在陆军中学才学了一个学期，日语学习也刚刚开始，考试能否合格，何应钦心中确实没有把握。尽管上一个学期考试的成绩，他在班上名列前茅，然而因童年和少年时代就养成的那种自谦与自卑仍使他缺乏自信。没想到这届考选，何应钦竟“以第一名应试”，同时被选中的还有谷正化、李毓华、朱绍良等 20 人。不久，这批拖着长辫子的清朝留学生就到了他们日思夜想的扶桑之国。

按照惯例，何应钦他们必须先入专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补习日语和军事基础课，三年之后考试及格方能毕业，再到军队经过一年的“士官候补生”的实习，才能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何应钦之前一届，当时名叫“蒋志清”的蒋介石已就读于振武学校。蒋在浙江籍的同盟会员中，已

经算得上是个谈论革命的积极分子。“蒋志清”对并不引人注目、又不善交际的何应钦仅只有一般的交往。这种上下期的同学关系，却成为十多年后何蒋关系的契机。

何应钦进到振武学校以后，日本军事学校中森严的等级制度，近于严酷的训练及营务管理，虽然远比清朝的军事学校更甚，但何应钦却觉得应该如此，毫无受不了的那种感觉。

对于一般中国留学生感到需要有个适应过程的衣、食、住、行方面的问题，何应钦除因语言障碍感到不便外，都可以随遇而安。当然，也有使何应钦愤懑不平、压抑身心的事情，那就是日本人对拖着长辫子的中国留学生所发的“豚尾之讪笑”。时间稍长，他也就从“优胜劣败”、胜荣败辱以及各方面的自我调适中得到解脱，潜心于学习和训练之中。

如果说何应钦到日本一段时间后，思想感情上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幼就从家教中习染的对神佛的迷信、对儒家思想的崇拜中，深切地感觉到中日之间“车同轨、书同文”的亲近。他为之“惊叹不已”的是“印度的佛教，我国的儒学，从来是构成东方道德的两大骨干，但能完全保存这两者的，却是日本”。对日本的“王道文化”有了初步的认同。二是自入贵州陆军小学就铭刻在心的“忠君爱国为本原”¹；振尚武之精神”的信条，在日本教官、军人对天皇的愚忠和武士道的精神影响下，进一步加强。作为军人，绝对服从命令；作为国民，绝对忠于君主，这两者必须统一，有了切实的范例。

但是，随着何应钦与中国留学生接触面的扩大，他的忠君与爱国之间产生了矛盾。许多留日学生都参加了同盟会，接受了反清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甚至在公开场合也表现出对“天朝”和大清皇上的不敬，这曾经使何应钦惶惑。不久，他也卷入了留日学生中这股反清革命的漩流，隐隐约约意识到自己

过去所矢志效忠的清王，原来竟是使中国遭受列强瓜分的祸根，有了一种挨打受欺者对冤头债主的那种不满。

在何应钦未至日本之前，在日本留学或因从事反清而流亡日本的贵州籍人士，有的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有的则加入了梁启超的政闻社。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里还成立了贵州分会，由贵阳人平刚任分会长，于德坤为评议部议员。1910年，从大冢文学院考入日本中央大学的兴义景屯人王伯群（字文选，王文华之兄）和另一位兴义同乡保衡，都已经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贵州分会对来自贵州的何应钦、谷正伦等多方关切，向他们宣传同盟会的宗旨。当时，“黔游学日众，同志（指同盟会员）且达数百人矣”。正是在辛亥革命前这股汹涌澎湃的反清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何应钦加入了同盟会。但他一心专注于学业，在革命活动方面并没什么足以引为日后夸耀的表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举国闻风响应。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其中的同盟会员，纷纷辍学归国，参加革命。在振武学校读书，或在日本军队中实习，甚至已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响应同盟会总部的号召，有人不待请假，就冒着当“逃兵”将被通缉或擅自离校而被开除的风险，争先恐后回国。

平素成绩优异、遵章守纪而受到校方青睐的何应钦，并没有采取擅自离校的办法，而是与一批同学一起，向日本政府多方交涉，得到准假后才着手打点行装的。但当时留日官费生的经济待遇并不宽裕，同盟会总部多方筹措，但资助给何应钦等人的回国经费，连购买统舱的船票都不够，致使何应钦等人归国的行程迟滞下来。最后，亏得平常就支持同盟会活动的久原房之助先生慷慨解囊，捐赠70万日元，才使何应钦等回到祖国。

何应钦回国后，便在振武学校的老学长陈其美领导的沪军都

督府任训练科一等科员。他模仿日本军事教育方式，军官以战斗教练为主，士兵则以提高射击技术技能和战斗动作为主，全师各营连争相仿效。不久，沪军都督陈其美筹组沪军，以高何应钦一班、与蒋介石同学的黄郛为参谋长兼第二十三师师长。蒋介石为该师第五团团长。何应钦虽不在蒋介石的团里，但却是在同一个师的第三团先任连长，旋升营长。这是何应钦与蒋介石同事关系的起点。

1912年10月13日，何应钦的母亲病逝。噩耗辗转传到何应钦那里时，已将近旬日。他匆匆请假奔丧，只得到慈母坟上恸哭，并为不得报答慈母养育之恩而抱恨终身。在家小住之后，又匆匆赶回南京任职。

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之后，企图以武力消灭反对他独裁统治的国民党。1913年7月，孙中山决定兴师讨袁，发动了二次革命。黄兴在江苏领导武装讨袁，何应钦出任江苏陆军第七师第一旅三团步兵营长，参加了二次革命。由于国民党人本身的软弱，无法抗御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先后宣布独立的江西、江苏、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和重庆等省区和城市的讨袁军纷纷失败。9月1日，张勋攻陷革命党人当时的大本营南京，二次革命失败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领导人逃亡日本。在讨袁军云流星散之后，许多中途辍学归国的留学生又返回日本，继续学业。何应钦于1913年12月重回振武学校。

从加入同盟会到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是何应钦由效忠清王朝向反对清王朝、参加民主革命的一个重大进步。正如他效忠清王朝时是真诚的一样，他的爱国、反清和追求资产阶级民主也是真诚的。在赴日本之前，尽管何应钦周围也或明或暗充满了革命气氛，但他似乎没有受到感染，未曾流露过对清政府的不满。留学日本，是他由正常运行的旧轨道转入尚不自觉的新轨道的开

始。这种转变，有他爱国的一定思想基础，但主要的却是时代潮流的裹挟而促成。

何应钦等人回到振武学校没有多久，学校当局就宣布他们这批学生结业。于是，他与云南大理人王绳祖和陈鸿庆等 6 人被分配到日本宇都宫步五十九联队实习。在日本军队中，长官对自己士兵动辄打骂的现象十分普遍，对前来实习的中国学生更是有意挑剔和处罚。何应钦他们只能忍气吞声，偶尔私下发发牢骚。当然，如果你能表现绝对的服从和完成任务出色，也会受到长官的嘉奖。何应钦除执勤外，还能帮勤务兵、马夫干一些杂活，深得日军小队长的好评，也受到士兵们的爱戴，由上等兵升为下士。

在入伍实习期间，一切生活行动，何应钦都尽力使自己完全像一个日本士兵。训练中，尤其注重术科，因而所有士兵与班长在平时、战时一切可能的遭遇及动作，他都必须完全了解并熟悉。这对他今后以日本的方式从事军事教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种十分艰苦的实习未及一年，便告结束。何应钦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 27 期步科。在士官学校与何应钦同期、其后又相继进入黔军的有步科的王绳祖、炮科的江苏武进人朱绍良、直隶顺天的张春圃及贵州同乡学炮科的谷正伦和学工科的李毓华等五人。何应钦在日本士官学校所受的教育，每周除两次野外、马术及劈刺等术科外，均以学校教育为主。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虽只属中级军校，但却为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了许多战争狂人和优秀的指挥人才。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罪魁祸首如东条英机、土肥原、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冈村宁次、炳俊六、田中义一、白川义则、松井石根、本庄繁、南次郎、荒木贞夫等，全是日本士官学校所训练出来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毕业于士官学校 16 期的冈村宁次，在侵华战争时期与何应钦有过戏剧般的相逢，彼此都对对方怀有敬佩与好感，是很要

好的冤家对头。

在日本士官学校，何应钦算得上最标准的“不会谈恋爱的留学生”。当时，不少中国留学生为了学好日语，想方设法要结交一个日本朋友。有些中国留学生被日本姑娘典型的东方美和温柔顺从的待人方式所迷惑，与她们谈起了恋爱。其中，还有个别浪荡子不堪远在异邦的孤寂，常在星期日或夜间去那些被何应钦称作“不干不净”的地方，与“不干不净”的日本女人厮混。何应钦在日本留学时间前后四年有余，论他的军人气派和士官生的身份，是颇能吸引女性的。但他从未结交过一位日本女朋友，他的星期日和闲暇时间，不是去从事打球、骑马和跑、跳之类的体育活动，便是在看戏当中消磨。他的这种洁身自好和学业至上的精神，连冈村宁次日后得知，都感到惊讶。据何应钦自己回忆说：“在我们留学的时候，学校方面管得很严，若与女人讲恋爱，被别人家报到学校，那就不得了。我既决心到日本深造，如因女人失足，就糟糕了。”何应钦在日本士官学校刻苦学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何应钦读士官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正是国内护国战争进行之际。

1916年5月，何应钦即将在士官学校毕业，而护国战争鹿死谁手尚未最后分晓。贵州都督刘显世和东路支队司令王文华对黔军军事指挥人才的渴求更感急迫。

1916年晚秋的一天，何应钦等六名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戎装耀眼，精神抖擞，走进了贵州督军兼省长公署，翻开了他们各自历史的新一页。

何应钦盲目地被人推上了从军之路，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如今怀抱远大目标，登上了日后统兵为将的第一道台阶。

棉湖苦战与惠州攻坚

何应钦棉湖一战成名，蒋介石从此对他另眼相待

当何应钦在黔军内讧中被逐，又在昆明遇刺，辗转到达上海，寓居内兄王伯群处继续调养枪伤的这段时间，中国发生了他所不知道的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也以个人身份参加大会。大会所通过的由中国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宣言中，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主张，确定了民主革命的新纲领，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广东成了中国革命的策源地。

黄埔军校的创建，便是孙中山在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帮助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伟大成果。鉴于没有革命军，便不能进行革命的惨痛教训，早在1923年，孙中山就作出了关于开办军官学校的决策，并于8月间派蒋介石等人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名义，赴苏联考察政治、党务和军事，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为组建新型的革命军作准备。

何应钦在上海期间，见到了即将赴苏联考察的蒋介石，知道了孙中山即将在广州创办新式革命军校的消息。这对失意彷徨的何应钦提供了重新振作的希望。因王伯群曾担任过孙中山护法军政府的交通部长、大总统府参议，何应钦便经其介绍，于1923年秋，首次到广州晋谒孙中山。

蒋介石正式受命筹办黄埔军校，亟欲罗致一批志同道合的本土官同学，负责军校训练工作。蒋早闻何应钦在贵州主持讲武学校，颇著成效，且何已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军事参议，加以王柏龄的极力保荐，蒋介石便电邀何应钦南下。

2月8日，何应钦赶到广州，在南提筹备处见到蒋介石，故知加新伙伴相见，“畅谈甚欢”。当天，何应钦就迫不及待地到长洲岛去看未来军校的校址。

1924年5月，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5月5日，从各省秘密奔赴广州的第一期学生进校，编为一、二、三队，嗣又将备取的学生编为第四队，总数为499人。这是从数千名应试者中选拔出来的佼佼者，从而保证了军校学生的政治军事素质。

5月9日，何应钦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校总教官。同日，廖仲恺被特派为驻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代表并派定了军校的各部主要负责人。当时所任命的军校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副主任是周恩来；教练部主任是李济深，副主任是邓演达；教授部主任是王柏龄，副主任是叶剑英；总队长沈应时。在教官中，有日后成为何应钦亲信的顾祝同、钱大钧、刘峙等人。孙中山则是军校的总理。在军校的领导班子中，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这一天，天清气爽，珠江上面陡然热闹起来。从广州出发的小火轮、小汽艇、小木船等纷纷向黄埔军校驶来。蒋介石、廖仲恺率领着何应钦等一班军校负责人和军乐队，在校门口恭迎孙中山等人。军校大门的上端装嵌着“革命者来”的匾额，门两侧写有“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的对联，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前来参加开学典礼的，除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外，还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汪精卫、林森、张继等，有外交总长伍朝枢、大

本营军政总长程潜、粤闽、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广州市党部委员孙科、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等及全体苏联顾问，可谓极一时之盛。

在孙中山的整个演讲中，何应钦屏息聆听，兴奋、激动异常。但他真正理解并真正赞成孙中山的这篇演说没有呢？也许如在场的切列潘诺夫所说：“未必！”身为总教官而与他手下的官佐、学生站在台下的何应钦，有如木桩，一动也不动。他无论对汪精卫指手画脚、拿腔拿调的讲话和胡汉民枯燥无味的、使听者昏昏欲睡的说教，还是对廖仲恺饶有风趣的演讲，都洗耳恭听，全神贯注，毫无一丝倦怠。这在所有教官中是独一无二的，也给蒋介石极深刻的印象。

下午 3 时，在大操场举行阅兵式，由何应钦任阅兵指挥官。

为了这一天的阅兵，何应钦花了不少心血。5 月 31 日，第一期学生预备教育期满，何应钦便进行了一次预演。这次的徒手检阅，说实话，所有学生都洋溢着革命的活力。但惯于讲究形式、排场，特别要显示自己的高深莫测和校长威严的蒋介石，并不满意，他在讲评时说：‘全体学生之精神尚感不足，缺乏勇猛威严之动作。嗣后须加倍努力，务使学生之精神振作，人人有吞敌之气慨。该军队教育不仅注意技艺之精巧，尤重精神之活泼，始能在战场以寡克众。’蒋介石这话，与其说是针对学生，不如说是敲打何应钦。果然，事后，何应钦对训练中的一招一式、举手抬足莫不遵循教范，严格要求。所以，开学典礼后的阅兵式，声势空前。499 名身着崭新苏式黄军装的学生，分作 4 队，由各队队长、副队长引领，在何应钦的统一号令下，正步通过检阅台，英姿飒爽，步伐整齐。紧跟着又进行了分列式表演和训练表演。长达两个小时的阅兵表演，使在场的粤、湘、滇等各军阀之侧目，深深佩服。

1924 年 11 月孙中山北上以后，广州革命政权并不巩固，而以

惠州、潮州、汕头一带为基地的陈炯明，依靠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的军事援助，纠合同类，号称 10 万之众，亟谋进攻广州，摧毁革命政权。

1925 年 1 月 31 日，黄埔军校举行了东征誓师大会。阅兵场上一幅白布黑字的标语：“杀陈炯明！”表达了全体黄埔学生军的心意。

2 月 1 日，何应钦的教导第一团乘军舰向虎门集结。次日，黄埔学生军三千余人和粤军的第十六独立步兵团组成的南路军，由蒋介石指挥，在虎门和太平集结完毕。当时，担任东征军总顾问的是苏联的加伦将军，担任何应钦教导第一团军事顾问的是切列潘诺夫和他的两个助手——炮兵别夏斯特洛夫和骑兵尼库林。

攻克淡水城后，黄埔学生军在其他东征军配合下，向汕头进军。在共产党人彭湃所领导的农民运动的积极配合下，海丰、潮州、汕头先后被东征军攻克。

在向汕头进军时，何应钦曾意外地遇险，靠苏联顾问和官兵的果断、奋勇而获胜。

2 月 20 日，何应钦率教导第一团在经稔山到海丰的途中，侦察部队在莲塘村北的高地与敌军遭遇。何应钦立即指挥全团展开战斗队形。不一会，另一大股敌人向左迂回，想侧击第一团。教导第二团在一团右侧也与敌交战。当时，站在高地上指挥作战的何应钦和切列潘诺夫，凭肉眼就可看清山下打着各自旗帜的敌我部队的调动、出击情况，但第一团却似乎未明白何应钦下达的是积极进攻，而不是就地应战的命令，趴在原地阻击敌人。而第二团更糟，他们不顾何应钦的第一团正受敌军正面攻击，又有被另一股敌人侧击的危险，竟按照蒋介石背着加伦将军所下达的命令：击退敌人进攻后即静静地驻守原地。

切列潘诺夫眼看第一团有被正面和左侧的敌人夹击的危险，

便向何应钦建议说：“应该给第二团作个样子，让他们向前冲！”同时，他又对助手尼库林说：“你来打机枪，用火力的掩护，我带一个连冲锋。”切列潘诺夫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用手势加他的“中国话”又喊又叫，终于使周围的士兵明白了，团部所下达的是冲锋命令，而不是打阵地战。于是，第一团的士兵们像一堵墙似地向前猛扑，这气势，使敌人不战而退。于是，切列潘诺夫成了这次遭遇战的直接指挥官。他后来回忆说：“战斗结束后，何应钦将军对我道歉很久，说他因为胸口疼，没能和我一起去进攻。”不过，在此之前何应钦确实向各营下达了主动出击的命令，只是由于学生军临战经验不足，没有很好地执行他的命令。

陈炯明为了挽回败局，便乘黄埔学生军深入潮、汕，兵力分散，形势孤弱，正拟回师广州之际，一面固守惠州，一面由五华、兴宁进出河婆、棉湖、鲤湖等地，南下截断黄埔学生军的后路，企图一举包围全歼，因而发生了第一次东征的决定性战役——棉湖之战。

棉湖是潮州普宁县西侧的一个小镇。普宁以东，多属平原地区，棉湖以西及以北，为重山峻岭。潮、汕一带，前临大海，后阻高山，交通四达，进不能攻，退无可守，被广东人视为用兵的绝地。敌军由棉湖向东作战，系由山地向平原，进展迅速；而黄埔学生军欲迎击敌人，向棉湖方面作战，系由平原向山地仰攻，进展迟缓，且后方交通已被陈炯明切断，能进不能退。

何应钦的第一团于3月9日西进，11日夜抵达棉湖。因敌情不明，12日清晨，第一团搜索前进。途中虽与小股敌人交火，但未见敌主力。向当地居民打听，有说敌人有一万余的，有说两三万的，有说前面所有山地树林中，早已布满敌人……何应钦手上的地图，几乎无用，只好凭目力所及，推断敌情。当时，第一团除三个步兵营外，加上团部学兵连、机关枪连、炮兵连、卫生队，

战斗兵员约 1500 人左右。而据原先所获情报，棉湖方面之敌，是陈炯明手下骁勇善战而著名的黄业兴、黄任寰、王定华三人为统率的 8000 余人，事实上，敌人是一万多，又是以逸待劳。

时间不允许何应钦犹豫和等待蒋介石下达命令，他集合全团，以蒋鼎文第一营攻击前进，刘峙第二营为预备队，第三营袭敌侧翼，策应主力作战。第一营前进不久便与敌人接火，很快被敌包围。二营初以连为单位增援，不待与一营连接，又被敌人包围。原拟从侧翼包围敌人的第三营，因敌人兵力过大，反攻战线又宽，一投入战斗，不仅形不成对与一、二营作战之敌的包围，自己也被敌人分兵迂回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各营、连，有的甚至是一排、一班，都只能独立地与十倍、数十倍于己之敌拼死作战，并两次打败了敌人向团部所在高地的包抄进攻。

何应钦在团指挥所里指挥战斗，团里唯一的那门炮因炮弹打完，约在上午 11 时左右变成了哑巴。何应钦、切列潘诺夫以及所有团部的人，谁也不记得究竟吃过早饭没有。趁敌军第二次攻势受挫之际，管后勤的副团长一个劲地催促：“吃饭，吃饭！”不待大家离开战位，敌人第三次进攻又开始了。何应钦手下只有学兵连是唯一的后备队。他亲自督导该连，以班为单位，向敌侧翼梯次出击，迫敌稍退，拉长了侧翼。

中午时分，钱大钧所率领的教导第二团抵达鲤湖，与第一团相距约七八公里。而原先驻鲤湖之敌，已先期转移至 5 公里外的和顺。钱大钧凭隐约的枪炮声判断，第一团正与优势之敌苦战。下午 2 时左右，遂下令兼程驰援，直扑驻和顺之敌司令部。敌后方被袭，全线混乱。

下午 3 时，粤军的第七旅也加入对敌的侧击。教导一团的三营、一营乘机向前推进，并占领了团部右前方的高地，敌人开始退却。直到这时，何应钦等才开始坐下来吃午饭。

但刚端起碗，突然从团指挥所左前方的高地传来一声大炮的轰鸣，紧接着又是一声，切列潘诺夫一把抓住何应钦的袖子，并指着三营和第七旅曾占领的高地让他看：粤军第七旅的士兵们乱哄哄地逃跑，教导一团三营也跟着往后跑。原来，敌人集中一个旅的兵力发起反冲锋。三营跟着第七旅跑过连接起来的一、三营之间的防地，出现了一个谁也无法顾及的大缺口。敌人就利用这一空隙，迅速攻到教导一团指挥所前。何应钦手里已经没有预备队好使用了，他的两个警卫员也一死一伤。在这关键时刻，他反而镇静下来，命团部警卫队“一面多插旗帜，以作疑兵；一面亲自集合团部所有官员，加入火线”。在何应钦、切列潘诺夫及其助手、副团长、参谋长警卫队及留在指挥所的卫生队、通信队人员所组成的战斗队的正面压制下，加以一、二营向敌人腰击，终于挫败了敌军企图打乱教导第一团指挥系统的阴谋。第一团转败为胜。何应钦的勇气和战士们的信心从何而来？连蒋介石都承认，“当激战高潮之际，正好来到前线劳军的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他穿着草鞋，帮忙搬运后方输送来的弹药，士气为之振奋。”各营、连的共产党员，亦表现了视死如归的精神。在指挥员牺牲或负伤以后，就主动地承担起指挥任务，组织向敌出击。教导一团在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情况下，几经肉搏，加以教导二团在和顺的猛攻和第七旅的助阵，苦战到薄暮，终于挫败了敌人的攻势。

这时候，蒋介石、加伦和廖仲恺都赶到教导第一团的指挥部，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奖励该团 1000 元。加伦当场解下身上的佩剑，赠送给何应钦。全团检点人数，伤亡几达三分之一。其中第三营，战斗开始前，官兵共 385 人，至此只剩下 111 人，营党代表、副营长阵亡，连长三员二死一伤，排长 9 人，阵亡 7 人，吴斌受伤，仅剩梁华盛完好。据吴斌事后回忆：当战斗最惨烈之时，“我团旗仍屹立在一个小高地上飘扬，团部的号兵，一阵阵不时吹

奏冲锋号音，我与敌胶着苦战的官兵，眼中看见团旗的飘扬，紧张惶惑的心情，就轻松安定下来；耳里听到团长发出的冲锋号音，大家的精神就奋发起来，向前冲去，伤者也忍着痛抬起头爬起来大声喊杀。”

当天夜半以后，何应钦又命令部队继续向敌攻击。陈炯明所部在教导一、二团的夜间攻势下，狼狈逃窜。

黄埔学生军付出惨重的代价，取得了棉湖战役的胜利后，继续攻克河婆、五华，于 21 日凌晨占领兴宁县城。第一次东征除惠州未被攻克外，基本达到预期目的。

棉湖苦战，确实堪称以少胜多，使广州革命政府转危为安的关键性一战。黄埔学生和何应钦也因此“一战成名天下知。”

平定刘、杨叛乱后，国民政府改组各军统称为国民革命军，何应钦的党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其余湘、粤等各军改编为 4 个军。8 月 26 日，蒋介石呈请任命何应钦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蒋介石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为自己的禁脔，本不愿意共产党和真正的国民党左派染指，但是，他还无法形成遮天的气候，需要利用左派外衣，争取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的支持，并博取了工农群众的拥护。

因此，在第一军的人事安排上，他是煞费了苦心的。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

因此，何应钦当了第一师师长，党代表就可以用共产党的周恩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周恩来推荐共产党员鲁易任党代表，蒋无论如何也不干，结果用了右派的；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蒋才同意让鲁易任党代表。何应钦第一师的顾问是切列潘诺夫。

此时，由于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叛，陈炯明重新占领了东江。军阀邓本殷则盘踞广东南路，与陈遥相呼应。陈、邓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纠合了东江、南路、北江和中路的势力，欲统一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发起第二次东征。

东征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9月28日，东征军正式组成，分三路纵队；第一纵队长何应钦，下辖国民革命军的第一师、第二师之第四团、第三师的第七、八、九团和第一补充团及吴铁城的独立第一师以及尚未改编的鄂军。第二纵队纵队长李济深，第三纵队纵队长程潜。第二次东征以何应钦的第一纵队为主力，目标是攻克陈炯明的老巢惠州，拟向响水、博罗之线前进，沿东江左岸肃清紫金、歧岭，而达兴岭、大埔一带之敌军。

10月9日，何应钦的第一纵队已进至响水、博罗之线，何则率第一师驻达湖镇。有了前卫，蒋介石的总指挥部才由石龙向博罗前进。第一次东征时，由于桂军刘震寰心存二心，暗与陈私通，对惠州围而不攻。当时加伦也认为没有必要一定要花大力去攻取惠州。第一次东征虽云胜利，但惠州未下，何应钦深引为憾，蒋介石牵肠挂肚。因此，第二次东征发动时，何应钦和蒋介石都大有惠州不克，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慨。

在何应钦看来，“惠州形胜天险，三面临水，一面临山，为粤东战略要地。陈逆主力盘踞于此。……摧破坚城，为东征制胜之最关键。”惠州城座落在东江左岸，东江的支流西江把城分为东西两部分。两座城均为高8至10米、厚6至9米的城墙所包围。城墙的外部 and 顶上一人高的城堞都是石头砌成。所有城堞上都用沙袋构筑了射击阵地。东、西城共有7座城门，均用铁皮包裹。为防御东征军进攻，7座城门全用圆木顶死，里面已填满柴棒、泥土和石块。城门上耸立着了望塔。而西城则被北面的东江、东面的

西江、南面的护城河及西面无法涉水而过的人工湖泊阻挡。真胜过欧洲中世纪的要塞。相传自唐代以来，虽为兵家常争之地，却未曾一破，颇有历久不衰的荣誉及诸如城墙上电网、城垣下有秘密通道等传奇般的杜撰。

当时据守惠州的是陈炯明手下骁勇善战、土匪出身的杨坤如所部约 3000 人。何应钦和蒋介石对惠州的城防底细并不了解，已经下达了三路纵队围攻惠州的命令后的次日，即 10 月 7 日 蒋介石还给杨坤如拍了一封电报，建议杨投向国民革命军。杨坤如看过蒋的电报后，认为蒋对攻克惠州缺乏信心，自己凭坚固守，以待李易标、陈修爵、黄任寰、洪兆麟、谢文炳等各路援军约 1 万人到达，便可里外夹攻国民革命军。

东征军队集结惠州城下以后，担任主攻任务的何应钦率领第一纵队的主要军官和顾问切列潘诺夫、炮兵顾问别夏斯特洛夫和基列夫、机枪顾问帕洛、工兵工程师亚科夫列夫等一起，在没有任何部队掩护的情况下，冒险乘快艇到惠州附近进行侦察。他们在距城墙约 1.5 公里的地方登陆，爬上更近的一个高地，从望远镜里观察惠州城防，确定了顺西城墙延伸的那些人工湖泊和北城门对面的东江之间一条约二三百米宽的狭长地带，作为强攻的主要通道。

经过实地侦察，对这座令人生畏而又兼赞赏的要塞能否攻破，或者是否有必要去攻克它等问题反而产生了。就连总指挥蒋介石也举棋不定。当时，已是秋季，何应钦手下有的军官甚至说：“要是两天之内拿不下要塞，就应当放弃它，要不人们都得感冒了。”何应钦未尝没有畏惧、犹豫和忧虑，但他明白自己已是蒋介石的离弦之箭，只有向前。能否攻下惠州，不仅军事政治上关系重大，是第二次东征成败的关键，也与他今后的命运休戚相关，因此，他挑选最强的第二师第四团担任强攻的先锋。第四团团团长刘尧宸，棉